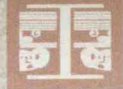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顾希佳 何王芳 袁 瑾 / 著

Hangzhou Shehui Shenghuo Shi

杭州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杭州社会生活史

顾希佳 何王芳 袁瑾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杭州社会生活史/顾希佳、何王芳、袁瑾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004-9686-1

I. ①杭… II. ①顾… ②何… ③袁… III. ①社会生活 -
历史 - 杭州市 IV. ①K295.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0858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mslxx123@sina.com)

侯苗苗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5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辛 薇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其煌 史及伟 李志庭 何忠礼

陈 铭 林正秋 周 膺 唐龙尧

徐吉军 顾志兴 顾希佳 薛家柱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原始社会生活	7
第一节 跨湖桥先民的生活风貌	7
一 渔猎与采集	8
二 弄潮乘舟	9
三 陶器制作	9
第二节 良渚先民的生活风貌	11
一 水稻种植	11
二 房屋建筑	13
三 纺织和衣冠服饰	14
四 制陶与制玉	15
五 原始信仰	19
第二章 宋前杭州社会生活	23
第一节 汉唐杭州社会生活	23
一 饭稻羹鱼的饮食模式	23
二 以舟为马,以楫为车	25
三 人生礼仪	26
四 节日民俗	30
五 断发文身与越巫	31
六 禹航传说及其他	34
第二节 吴越国杭州社会生活	37
一 东南佛国与民间俗信	37

二	钱塘江与民众生活	45
三	民间传说与歌谣	51
第三章	宋代杭州社会生活	55
第一节	衣食住行	55
一	饮食	55
二	服饰	59
三	居住建筑	62
四	游船与海运	65
第二节	岁时节令	68
一	元宵节	68
二	清明踏青	71
三	浴佛节	73
第三节	市井风貌	75
一	街市贸易	75
二	商贸风俗	78
三	瓦舍勾栏与民间说唱	82
四	集会与结社	86
第四节	赏玩游冶	89
一	斗茶与茶俗	90
二	饮酒风俗	93
三	民间游艺	96
四	城市园囿	100
第四章	元代杭州社会生活	105
第一节	都市经济与移民	106
一	城市基本生活设施	106
二	都市经济与社会生活	107
三	户籍与移民	111
第二节	宗教与民间信仰	112
一	杭州行宣政院和僧寺经济	113
二	外来宗教的传播	114
三	民间信仰中对于预兆的迷信	117
第三节	游艺与家庭器物	118
一	游览	118
二	竞技与游戏	119
三	戏曲	121
四	住房与家庭器物	121

第四节 生活风俗	123
一 饮食	123
二 服饰	124
三 人生仪礼	126
第五章 明代杭州社会生活	129
第一节 岁时节日	130
第二节 衣食住行	135
一 饮食和民居	135
二 杭儿风及其他	138
第三节 婚丧仪礼	141
一 婚俗	141
二 性爱之风	143
三 丧俗	145
第四节 宗教与民间信仰	146
一 佛教、道教信仰	146
二 多元的民间信仰	148
第五节 娱乐与文学艺术	151
一 酒楼、茶馆、戏班与庙会	151
二 猜灯谜、赏月、观潮与游湖	153
三 小说、民歌与说唱	156
第六章 清代杭州社会生活	159
第一节 宗族组织与社会救济	160
一 宗族组织	160
二 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	162
第二节 衣食与婚丧	166
一 剃发易服	166
二 饮食结构与消费行为	167
三 婚丧仪礼的变迁	173
第三节 岁时习俗与娱乐	179
一 岁时习俗	179
二 民间娱乐	182
三 游乐与旅游	185
第七章 民国时期杭州社会生活	191
第一节 日常消费生活	191
一 衣冠服饰	192

二 饮食风尚	193
三 居住与建筑	194
四 行旅交通	195
第二节 婚丧仪礼	199
一 婚嫁	199
二 丧葬	200
第三节 民间结社与社会公益事业	201
一 民间社团与慈善机构	201
二 民间社团的活动及其影响	206
第四节 宗教与民间信仰	207
一 宗教信仰	207
二 香市与庙会	211
第五节 酒肆茶楼与旅游	212
一 酒肆茶楼	212
二 旅游的开发与兴盛	215
 第八章 新中国时期杭州社会生活	 223
第一节 休闲之城的勃发	223
一 城市新气象	223
二 中国茶都	225
三 东方休闲之都,品质生活之城	227
第二节 衣食住行的时尚	231
一 吃在杭州	231
二 女装之都	236
三 宜居城市	238
四 快捷、绿色的交通	241
第三节 人口、家庭与社会保障	246
一 计划生育和生育观念的变化	246
二 家庭人口小型化	251
三 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	253
第四节 婚丧观念的变迁	256
一 择偶观念	256
二 离婚	258
三 黄昏恋	260
四 性观念的变迁	260
五 殡葬制度改革	264

绪论

一 学术史回顾

社会生活史是一门研究历代社会生活事象及其演变规律的学问，它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不过由于它的出现相对较迟，对于它究竟应该主要研究些什么的问题，迄今在学术界还有所争议，见仁见智，无法统一。然而，有一点是许多人都有同感的：在我国史学界，以往的研究重心历来是政治、制度、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而较少关注社会生活，尤其忽视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这种局面大概一直沿袭到20世纪初。正如梁启超所说，旧史“不过记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是帝王家谱”^[1]。一部二十四史，可以说只不过是一部帝王将相史、精英人物史、改朝换代史而已，而创造中国历史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他们的历史却历来没有进入正统史学家的视野，也没有在卷帙浩繁的史学经典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在世界范围内，起初的局面也大抵如此。而法国“年鉴学派”的崛起在史学界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们主张从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去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把各地居民的日常起居、食品、服饰、婚姻、家庭、教堂、梦想等生活状况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样一来，情况也就大不一样。在我国，由于一些接受西方思想较早的文化启蒙人物的倡导，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就在20世纪初拉开了帷幕。尽管对于这门学问的定义、研究对象及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毕竟帷幕已经拉开，演员也都登上了舞台。

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1911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诸如张亮采《中国风俗史》（1911）、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1925）、陈东远《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吕思勉

^[1]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

^[2]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9页。

《中国宗族制度小史》(1929)、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1937)、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等,有一大批著述问世。单篇论文更多,每有新的开掘,令人耳目一新,筌路蓝缕,开启山林,虽然尚嫌粗疏,却已功不可没。

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生活史研究基本上停顿,虽然也有几种专著出版,却寥若晨星,不成气候。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社会生活史研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特别是中国社会史学会成立以后,先后在各地举行一系列年会,形成了一股热潮。社会生活史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受到莫大鼓舞,许多学者纷纷转向这个新领域,立志开拓,虽然声音不甚整齐,却已十分嘹亮,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这个时期里的著述不胜枚举,堪称百花齐放。首先要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推出的一套多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作为国家重点科研规划项目,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再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多卷本《汉族风俗史》,虽然并非社会生活史,但在许多方面都与之相通。此外,还有一大批社会生活史专著,或专攻某一专题,或详述某一断代,学问越做越深,往往有新的创见,令人鼓舞。其中林正秋的《宋代生活风俗研究》,就是杭州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先行,颇具功力。

这种可喜的局面不仅仅表现在以“社会生活史”为己任的专门性著述中。由于史学界观念的更新或拓宽,即使在通史范畴里,或是其他一些史学领域,学者们也都开始关注起社会生活史的话题。或者说,在史学研究中,学者们开始注意用相当的篇幅来讨论底层民众的生活,逐渐成为一种风气。

关于社会生活史的定义、概念、性质、对象、范畴乃至研究方法的界定,以及它与相邻学科,诸如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关系的处理,近来常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比如,社会生活史与社会史究竟有什么区别?社会生活史与风俗史又有什么区别?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当然,这种讨论也应该宜粗不宜细,大家不妨先按各自的理解做起来,再慢慢趋于规范。“摸着石子过河”,渐渐地也就可能会达成共识了。具体而言,不同的断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乃至不同的人群,其社会生活史的侧重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不同学者的学术风格,当然更是会影响到他们的学术成果,这也是应该注意到的。

本书的书名是《杭州社会生活史》,这里的杭州应该指今天杭州市所属市区以及七县(市、区)的大杭州。在历史上,它的疆域区划也常有变化。不过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所依据的史料主要还是来自作为城市的杭州市区,对于周边所属县(市、区)的史料,掌握得还并不太多。历史

研究受史料的制约是必须面对的事实，即使有了很美好的设想，在研究过程中有时候也还是不得不有所变通。我们的工作正是在这样一种态势里开展起来的。

二 史料概述

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研究所需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类：首先，考古发现和各种传世文物，包括古建筑在内，可以使今人大致猜测历史上的社会生活状态。其次，历代文人留下的文字典籍，主要是史书、政书、类书、专书、方志、笔记、小说、文人诗文史评、宗教文献等；这中间还应该包括大量的手抄本、民间文书、谱牒、碑刻，这里记载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状况，抑或追记了离作者的生活年代较近的那些事件或生活相。作为文字材料，外国人的游记和近现代的报刊，也应该受到重视。最后，向今天还活着的人做社会调查，采纳他们所提供的口述史。这三者各有长短，倘若能加以配合，相互印证，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工作，便可大致上弄清楚历史上民众的生活状况。

杭州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我们大致上也是这样去做的。

一般认为，杭州主城区的这片土地在上古时代是浩瀚大海。由于海岸线的变迁，后来才出现了陆地和湖泊，陆续才有了人类居住。这一带重要的考古发现有二，一是跨湖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二是良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前者发现稍晚，却将这一带先民的生活年代上推至 8000 多年前。后者的发现较早，不过一些重要的发掘也是新近才得以完成的。大量出土文物揭开了四五千年前杭州先民的神秘面纱。通过遗址和相关出土文物的考察，已有学者开始大胆推测那个年代里先民的种种生活风貌。不过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文献典籍来详加记述，今人的这种研究必须十分谨慎小心。

虽然文献典籍出现得也相当早，但是直到汉代，这一带的文化还明显落后于中原。在诸如《诗经》、《礼记》、《仪礼》这样一些著名的文献里，我们已经可以读到古代作家对当时中原一带社会生活的大量记述，然而却不能用来印证当时的杭州社会生活。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这一带“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毕竟有些语焉不详。前面一句是说这一带人烟稀少，还不成气候，后一句倒是把那时候这里的饮食习惯大致上勾勒出来了。汉代文献中，《越绝书》、《吴越春秋》、《论衡》是史家经常采用的，从中可以发现杭州社会生活的一些线索。不过这些文献的重心并不在杭州。有唐一代，可供稽查的杭州地方文献仍然十分稀缺，或者说虽有一批文献已经可供查阅，但其中可为社会生活史所用的却是凤毛麟角。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五代吴越国时，才有所

改观。

虽说秦嬴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这块土地上已置钱唐、余杭二县，同属会稽郡，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一直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地方。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这里始称杭州。这时候已经开凿了江南运河，后来又建造了杭州城。隋唐时期，杭州借着运河的福祉，逐渐显露头角，到了吴越国时，杭州终于被称为“东南第一州”了。

钱镠建吴越国，定都杭州，坚持“保境安民”国策，统治八十六年之久。记载这一段历史的典籍相对较多，《吴越备史》、《十国春秋》、《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湘山野录》、《枫窗小牋》、《钱塘遗事》、《太平寰宇记》、《咸淳临安志》等，往往保存着可供钩沉的宝贵史料，如果与这一时期的一些出土文物相印证，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就有可能获得某些生动的印象。

宋代，尤其是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在杭州的历史上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有关这个时期的杭州，史料之丰厚有目共睹。除了正史之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文人笔记。这时候的文人已经对社会生活发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他们笔下不厌其烦地记录起社会生活来，从而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诸如《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等，都是不得不提到的。

《梦粱录》二十卷，宋代钱塘人吴自牧撰。该书用“黄粱梦”典故作为书名，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是为了“缅怀往事”。举凡山川景物、节序风俗、公廨物产、市肆乐部，无不详载，有的来自地方志，也有的是作者耳闻目睹。其中卷十六，对当时杭城的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米铺、肉铺、鲞铺的经营活动，有着不厌其烦的叙述。仅在分茶酒店一节，作者开列当年这一类酒店中所能供应的饮食品种（即菜单）就有将近四百种之多，有的菜肴名称，今人已经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卷二十所记嫁娶、育子、妓乐、百戏伎艺、角抵、小说讲经史，是研究宋代民俗和艺术的珍贵资料，也自不待言。

《武林旧事》的作者周密，著作颇丰，尚有《齐东野语》、《癸辛杂识》等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武林旧事》，誉之为“耳睹目闻，最为真确”。该书所记，涉及朝廷典礼、岁时节令、市肆交易、诸色伎艺等各个方面，一向与《梦粱录》并称。其中所记伎艺人姓名之多，也令人吃惊。

《西湖老人繁胜录》，作者“西湖老人”不知何许人。该书记南宋杭城的社会生活，既琐细而又珍贵。《都城纪胜》，作者灌圃耐得翁，也没有留下他的真实姓名。他与“西湖老人”一样，有感于南宋末年的时势，心情十分复杂，都不愿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不过这两种笔记在社会生活史范畴里的珍贵价值毕竟让后人对他们肃然起敬。一般认为凭借以上四种笔记，今人对于南宋杭城的社会生活已经可以有个大致的了解。如果进一

步查阅这个时期的史书方志、文人笔记，自然还会获得不少珍贵材料。

搜寻元代杭州社会生活史料时，有几位外国人帮了我们的忙。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口述成书的《马可波罗行纪》，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元代杭州，虽有失偏颇之处，却毕竟十分珍贵。还有《鄂多立克东游录》、《伊本·白图泰游记》等书，也应该予以关注。

这个时期的文人笔记中，尤以孔齐《至正直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值得关注。

明代，史学家郎瑛是杭州人，他的《七修类稿》涉猎颇广，从中寻找杭州社会生活史材料，往往会有可喜的收获。张瀚《松窗梦语》、张岱《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高濂《四时赏幽录》等书，也大抵如此。特别要指出的是，杭州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以记西湖掌故轶事见长。该书所记杭州生活习俗、岁时节令，以及各种游戏、技艺，甚至方言俚语、故事谣谚，都十分详尽而传神。

这个时期里的通俗小说相当繁荣，尤以“三言两拍”最具影响，其中就有不少作品以杭州为背景。又有周清源《西湖二集》三十四卷，几乎每篇故事都与西湖有关。凡此种种，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当年的杭州社会生活提供了诸多线索。

清同治年间，杭州人范祖述撰《杭俗遗风》面世，民国年间又有洪如嵩为之补辑。这是一本专门记述杭州民俗的好书。书分时序、乐善、声色、婚姻、寿诞、丧事、排场、俸品、女工、饮食、驰名、备考十二大类，已经初具杭州风俗志之规模，难能可贵。其中乐善类之下，又有普济堂、清节堂、育婴堂、义学馆、济仁堂、栖流所、舍材局、瘞埋局等共23则，详述清代社会救济事业概况，其中“补辑”部分还提到民国年间的一些情形。其他各大类材料之珍贵，也是如此。

在饮食方面，李渔《闲情偶寄·饮馔部》、袁枚《随园食单》也值得一提。尤其是后者，详述杭州一带菜肴的烹饪技艺，是研究杭帮菜的重要史料。

这个时期里的史书方志、笔记小说更多，从中寻觅社会生活史的材料，比起宋前来，当然已经容易得多了。

这样一种趋势十分明显，即年代越是晚近，史学研究的材料总是越丰富。尤其是在社会生活史领域，自从报刊出现后，从报刊上寻找此类材料往往更能令人满意。

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更多的学者开始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向如今还健在的老人访问，可以知道近百年间社会生活的详细情形，这是不必怀疑的。如果再拿来与近百年间的文字史料相印证，结论也就更加会令人信服。

如上所述，杭州社会生活史的写作离不开上述各方面的史料，我们的主要工作也就是搜集这些史料，然后再深入研究，力图探索其嬗变规律，有所发现。

三 本书体例与基本评价

对于杭州地方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早，著述亦十分丰厚，其中尤以南宋建都临安这个历史时期的研究格外引人注目。此前的学者研究杭州地方历史，已经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社会生活史料的开掘，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地，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过，迄今尚未出现一部较完整的杭州社会生活史。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写作具有某种填补空白的意义，因此令笔者更觉肩上的担子之沉重。

按照我们的设想，杭州社会生活史大致应该包括人口与聚落分布迁徙、家庭与民间结社、衣食住行、生产经贸、人生礼仪、岁时节令、宗教与民间信仰、卫生保健、灾害与救济、休闲与娱乐等一系列内容。社会生活理应涉及社会各阶层，不过尤应关注历来被忽视的底层民众。

关于篇章结构，本书仍采用常见的断代格局。考虑到宋代以前的史料相对匮乏，所以析为二章。宋、元、明、清、民国，直至新中国时期，按照惯例，各列一章。不过，这种篇章结构是否适宜于社会生活史写作，也是有待商榷的。许多人都知道，大量的社会生活在历史的长时段里总是相对稳定的，并不受改朝换代影响，更不受突发事件左右。即使它们各自也在嬗变，却往往较缓慢，有着它们自己的内在规律。过分强调断代，往往会把它们搞得支离破碎。有的学者正是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形，而采用专题形式写作，致使作品不像“史”却更像“概论”，避免了行文的重复。当然，这种写法也有它的弊端，使得我们还不忍贸然采用。不过从实际出发，我们在断代格局的大前提下，也往往会从某些社会生活事象的实际出发，对于它们各自的生活史，尽可能“上挂下联”，作系统论述，虽然暂时脱离了断代，却使读者能对所论事象有个相对完整的印象，而不至于破碎。

本书是一个集体完成的课题。具体分工为：顾希佳承担总体设计、统稿和绪论撰写；袁瑾负责第一、二、三章撰写；何王芳负责第四、五、六、七、八章撰写。何王芳、袁瑾两位年轻女博士的加盟，给这个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活力，使我们看到了希望。不必讳言，本书的写作还很不成熟，在不少地方仅仅是发掘或梳理了相关材料，尚未进入严密的思辨，一些论点也还有待修正。我们真诚地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我们的耕耘还将继续下去，期待着能有进一步的成果。

第一章 原始社会生活

考古资料表明，8000 年前，如今杭州一带的范围内就已经有了人类生活的遗迹。跨湖桥与良渚先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留下大批陶器、石器、玉器、木器以及麻丝织品等，其制造工艺之精良，直到今天还令人叹为观止。春秋战国时代，这一带曾是吴越两国争夺的地方。公元前 222 年，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始置县，当时这一带有钱唐、余杭二县。经过两汉、三国、两晋漫长的历史，这里一直处于缓慢发展中。直至南北朝陈祯明元年（587 年），这里成为钱唐郡。杭州的真正崛起是在隋唐两代。隋开皇九年（589 年），废钱唐郡置杭州，至此，杭州的称呼开始正式使用。唐代贞观以后，杭州一跃成为“东南名郡”，人口激增，城市不断扩大，经济文化一片繁荣，成为东南交通枢纽，一个商贾云集、各地奇珍汇集的商业城市。逐渐形成了一大批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事象，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早在史前时代，跨湖桥、良渚先民就已经开始尝试水稻种植、乘船弄舟、撒网捕鱼，江南鱼米之乡初具雏形。由汉至唐，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令风俗逐渐成形，并且留下了大量丰富的口头文学，社会生活日趋丰富。自然信仰、神灵信仰等民间信仰形式在这一带民众内心逐渐积淀下来，成为民俗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且也成为后世民众心愿意识发展的源头。

第一节 跨湖桥先民的生活风貌

跨湖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杭州萧山区城厢街道西南约 4 公里的湘湖村跨湖桥西南约 700 米的湘湖地带，以跨湖桥命名。其西南 7 公里

为钱塘江与支流浦阳江的交汇处，南北都为低矮的山丘，群山环抱、水土丰盈、植被茂盛。8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祖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独特的跨湖桥文明。采集、渔猎、耜耕农业支撑着他们的基本生活。他们制作骨器、木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制作各种各样的精致陶器作为生活器皿，并出现了交叉绳纹图案。

一 渔猎与采集

早在 8000 多年以前，跨湖桥先民就开始了稻作生产，跨湖桥遗址各个地层都发现了水稻遗存，共计稻谷、稻米和稻谷壳 1063 粒。中期地层发现集束状带茎秆的秕谷遗存。当时水稻栽种仍处于原始低产量阶段，^[1]并且极“可能驯化自本地的野生稻，是尚未完全分化的原始栽培稻”^[2]。

骨耜是主要的水稻种植工具。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使用骨耜了。它一般由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制成，上端厚而窄，有一横孔；下端薄而宽，有两竖孔。装柄的方式采用捆绑式，即在横孔插入一根横木，用藤条捆绑固定。两竖孔中间安上木柄，再用藤条捆绑固定。骨耜比石器轻便灵巧，而且表面光滑，不易沾泥，适宜在江南水田里使用。跨湖桥发现的骨耜也是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肩臼部位、顶端和脊柱边缘都经过修整。与河姆渡骨耜采用捆绑式不同的是，跨湖桥发现的骨耜上端部有圆形插孔用以装柄，成孔方式是用火烫灼后再行挖凿。

稻谷遗存和以骨耜为代表的水稻栽种农业工具的发现，可以说明跨湖桥先民已经进入了耜耕农业时代。然而，此时稻作并不是主要的经济形态，先民的生活仍然主要依靠采集和渔猎。

江南地区果木茂盛，根据考古发掘来看，跨湖桥先民采集食用的果实种类十分丰富，有桃核、梅核、杏核、麻栎果、栓皮栎、白栎果、南酸枣、菱角、芡实，还有豆科、葫芦科、山茶科等的植物种子和果实。

他们不仅挖坑储藏采集来的果实，还利用“橡子坑”对橡子果实进行二次加工。橡子坑，坑穴呈筒状或者袋状，坑壁以及口部有木料搭成的框架作为支撑。有的坑口还被二次利用，有锅底状灰烬焦积而成为烧土坑。有关学者据此推断，这些坑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储藏坑，还极有可能是针对橡子果实进行加工的某一个环节。^[3]由此可见，采集野生果实仍然是跨湖桥先民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

狩猎是当时人们另一个主要的食物来源。现在可以确定的人工饲养动物是狗和猪。跨湖桥遗址发现的家猪是迄今为止南方地区最早的家猪。水牛尚未家养。^[4]猪、牛等动物的牙齿磨损程度普遍较高，说明年迈体弱的动物是跨湖桥先民主要的肉食来源，它们往往缺乏抵抗力而成为捕杀的对象。许多哺乳动物的骨头都有火烤痕迹，四肢的骨头端部砸断的现象也比

^[1] 蒋乐平：《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2002 中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 页。

^[2] 同上书，第 6 页。

^[3] 王海明：《河姆渡文化溯源思考》，《河姆渡文化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4 页。

^[4] 刘莉、陈星灿、蒋乐平：《跨湖桥遗址的水牛遗存分析》，《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一：跨湖桥》，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44—348 页。

较普遍，反映了烧烤食肉和吮吸骨髓的事实存在。^[1]此外，鼠、狗、虎、獾、梅花鹿等也是常见的猎杀对象。考古学家甚至还发现了天鹅、雁、鸭、雕、丹顶鹤等鸟类的残骸。

狩猎的工具主要有弓、镞、镖等，而浮标的发现则可以说明当时已经有结网捕鱼的行为存在。水生动物种类有蟹、鲤鱼、龟、扬子鳄等。

史前时代杭州地区丰富的动植物自然资源为跨湖桥先民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构成了这一带先民以采集渔猎为主，耜耕农业、畜牧为辅的生产形态。

二 弄潮乘舟

杭州一带水网密集，水上航运是杭州湾两岸较为普遍的交通方式，为了适应水网环境，跨湖桥先民们制作了独木舟。

独木舟长5.6米，基本保存完好，是考古人员于2002年11月22日在遗址第三期发掘中发现的，一同出土的还有2件木桨、石铤、石器崩片、砺石、编织物等文物。有关专家认为，这里应该是一个与独木舟有关的木作加工现场（作坊）遗迹。^[2]

发现时，独木舟船头朝东北，船尾朝西南，船帮部分有损坏，船身宽窄不一，最宽处53厘米，比较狭长，船体深20厘米。船体较薄，底部与侧舷厚2.5厘米，接近船尾的一小部分因附近砖瓦厂取土而被截掉。独木舟由马尾松木制成，经过石铤等打磨加工，船身上纵向加工过的痕迹非常明显。并且，在船体凹面内，还可以看到多条支撑横木的痕迹。

古船处于遗址第九文化层，考古学家据此相应推断出独木舟的“年龄”为7600岁到7700岁。该独木舟是大陆沿海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艘独木舟。^[3]

船舷内留有多处黑炭面，考古学者由此推测，独木舟主要借助火焦化开凿船体。即先民在木料一面涂上湿泥巴，另一面则用火烘烤。烘烤后，涂湿泥巴的一面完好无损，另一面表面则被碳化。再用石铤、石斧等工具将碳化层去除。如此交替反复，层层下砍，遂成一舟。^[4]

独木舟是真正意义上的水上交通工具，它不仅能够坐人载物，而且具有一定的抗击风浪的能力。它的出现，大大拓展了这一带先民的活动领域，扩大了赖以生存的空间。这一地区史前遗址中频频发现木桨，除了跨湖桥遗址之外，余姚河姆渡出土木桨3把，慈山遗址出土5把，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1把，杭州水田畝遗址出土4把，余杭卞家山遗址出土2把。这些木桨的出土，可以说明当时这一带独木舟的运用已经相当普遍了。

三 陶器制作

陶器是跨湖桥先民较为常见的生活用器，可以作为容器、炊具使用，

^[1] 徐建军：
《7000年前的人这
样生活》，《都市快
报》2000年7月25
日第10版。

^[2] 蒋乐平等：
《跨湖桥遗址发现
中国最早的独木
舟》，《中国文物
报》2002年3月21
日第1版。

^[3] 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萧山
博物馆：《浦阳江
流域考古报告之一：
跨湖桥》，文物出
版社2004年版，第
265页。

^[4] 蒋乐平等：
《跨湖桥遗址发现
中国最早的独木
舟》，《中国文物
报》2002年3月21
日第1版。